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二一年第二期

总第29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01 从公路货运大数据看中国七大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探索改革

07 豫医保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出台 搭建未来10年医改框架

08 “户籍墙倒”加速城镇化

经济广角

11 读准读好一季度经济形势

12 跨区域联动 京港金融合作创新空间大

科教文卫

14 大数据驱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16 以演出为中心 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三农问题

18 中国未来城市化趋势：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

19 城乡融合发展重在推进六个转变

社会观察

21 便宜的“临期食品”撑起百亿市场

综合治理

24 延迟退休配套措施如何完善

环球视野

25 亚洲何以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28 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形势

时事观察

31 专家热议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

34 深刻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

讯息快递

从公路货运大数据看中国七大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英国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21年4月24日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跨过百万亿元的门槛，人均GDP也超过7万元人民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当前的发展仍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在双循环战略布局深入推进的同时，城市群发展战略成为中国打造增长极、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未来将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20年，中国七大城市群覆盖人口超过7.7亿，GDP总额超过63.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63%。中国七大城市群的发展情况，决定了中国整体的发展前途。

观察中国七大城市群发展状况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经济发展成绩，二是区域内经济融合互动的水平。长期以来，区域经济的融合互动水平是较难测量的，而连接量超过180万辆卡车的G7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可以全面获取车辆轨迹、驾驶行为、能源消费、园区管理、货物运输等公路货运大数据。分析发现，各城市群GDP与其区域内货运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9，货运量数据是观察经济发展情况较为有效的指标。基于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货运量数据一窥中国七大城市群的经济融合发展情况。

目前，各城市群的经济水平如何？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中心城市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南部的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波5个都市圈，共26个城市，覆盖人口1.5亿。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GDP总量超过20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20%，与印度的GDP总量相当，是七大城市群中经济规模最大的。

本文中研究的珠三角城市群不包括香港和澳门，仅包括广东省的“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个都市圈的9个城市。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总量近6500万，2020年GDP总量超过8.9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9%。作为横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29市，覆盖人口超过1.2亿的大型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GDP总额超过8.9万亿元，略高于珠三角城市群，也高于京津冀城市群。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城市群，人口规模超过1.6亿，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其GDP总量也达到了8.1万亿元，仅次于京津冀城市群。覆盖重庆、成都及周

边14个城市的成渝城市群的GDP规模达到了6.8万亿元。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不到4000万，GDP仅2.2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不及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的城市GDP总量。

GDP总量是对各城市群体量的测量，而人均GDP和单位国土面积GDP则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GDP达到13.9万元，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创造的GDP达到1.59亿元。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为13.1万元，与珠三角城市群差异不大，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GDP产出也达到9657万元。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水平是最高的，且区域内各城市的发展落差较小。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接近。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均GDP为7.6万元，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均GDP为7.2万元，接近全国人均GDP水平，但是，北京和河北两地的发展差距很大，北京的人均GDP为16.8万元，而河北省的人均GDP仅为4.8万元。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是最低的，人均GDP均在5万元左右，低于2020年全国人均GDP7.2万元。

根据G7公路货运大数据的监测数据，长三角地区的货运量占到全国的16%，珠三角地区的货运量占到了全国货运量的10%，是占比最高的两个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规模虽然接近，但货运量占比明显低于珠三角，这与各城市群的产业分布特点以及与外部区域的联系度有关。

各城市群的内部经济融合互动的水平如何？

融合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题中之意，也是发展的动力来源。基于G7覆盖超过180万辆货车的公路货运大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区域内不同省市间的经济融合互动水平。对于一个城市群，区域内部货运物流量在其全部货运量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城市群内的经济融合互动水平越高。珠三角城市群同处广东一省，文化相近，且区域面积较小，各城市间距离近且交通便利，产业协同度高。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度是最高的。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内城市处于较高的水平。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水平高，但城市群横跨三省一市，除上海外，尚有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和宁波5大都市圈，它们之间的融合互动面临更大挑战。目前，京津冀三地因为区域经济发展落差、体制和机制障碍等原因，中原城市群因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不足以及整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差等原因，内部经济联系度是最低的。从最近三年的Q1数据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2020年和2021年的经济联系度是持续快速提升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部经济联系度在2020年也有所提升。2021年1季度的货运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以“工业品和机械设备”运量占比最高，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快递整车运量占比最高。中原城市群的运量中，41%为矿石金属，而关中平原以农产品运量占比最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商品汽车运量占比达到了14%，远高于其他城市群。珠三

角城市群内货运商品以工业品及机械设备占比最高，达到31%，生产协同度较高。

广州、东莞和佛山是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融合互动的中心城市，尤其是东莞和佛山，得益于制造业的发达，在区域经济联系度方面的贡献要高于其GDP占比。深圳的GDP最高，但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商品汽车的货运占比达到14%，远高于其他城市群，这与该地区汽车制造业较为发达有关，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协同。此外，工业品及机械设备和矿石金属的货运占比也分别达到13%和11%，工业生产协同水平较高。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协同有望进一步加强。

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GDP最高，在城市群内起到了引领发展的作用。此外，得益于区位和产业优势，湖北的孝感和荆门发挥了更多的区域经济联系的作用。长沙和南昌同样是省会城市，长沙的GDP和区域经济联系作用相对更强。

成渝城市群的工业品及机械设备货运占比达到17%，仅次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化工产品的货运占比达到9%，在所有城市群中是最高的。成渝城市群在化工及工业方面的生产协同水平较高。对于成渝城市群，重庆的GDP占到了区域内的37%，高于成都，但重庆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与其GDP规模不匹配，成都才是成渝城市群中融合互动的核心城市。成渝城市群进一步的协同发展，需促进重庆与四川其他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联系。

长三角城市群的货运商品中，工业品及机械设备类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生产协同度较高。长三角地区，上海市的GDP区域占比达到19%，但货运占比仅为13%，这与其工业经济在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低有关。在区域经济的协同方面，苏州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14%）。杭州和嘉兴的经济协同作用也超过了其GDP地位。南京目前在区域经济协同方面的作用仍低于其GDP地位，毕竟，其距离长三角以上海市为中心的核心地区相对更远，联系相对不便。

农产品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内部跨省货运比例非常高，达到了28%，远高于其他城市群。但与工业生产相关的货运量较低，这与该城市群的工业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在西安和咸阳地区有关，其他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弱。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七大城市群中发展较为落后的一个，人口规模小，人均GDP低。西安在城市群中的首位度非常高，GDP在城市群内占比高达44%。咸阳紧挨西安，与西安同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之一，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高达22%，仅次于西安的26%。此外，运城市在区域经济融合互动中发挥的作用也较为突出。

京津冀之间的货运以生活协同为主，三分之一为快递整车，其次是日用百货和食品饮料，分别占16%。矿石金属、工业品及机械设备等与生产协同相关的货物运输量仅为

14%和8%，三地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协同度较低。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需要中心城市的带动来逐渐实现。京津冀来看，北京的GDP总量占到区域的42%，但是，在经济协作方面，北京发挥的作用与其GDP水平不太匹配，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有关。《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京津冀的区域协同中心城市是北京、天津和廊坊，三地的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分别为23%、22%和17%。相对于经济规模更大的唐山和石家庄，廊坊基于地理优势，在京津冀融合互动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中原城市群的矿石金属货运占比高达41%，煤炭货运量占比达到12%，体现了该城市群在重工业领域的协同度相对更高。中原城市群以河南为主体，河南省内城市间的区域内经济联系也是更强的。河南省会城市郑州的区位经济较为突出，占到区域内GDP总量的15%，但其货运量在区域内的占比达到了21%。而区域内其他城市的GDP占比和货运量占比均未超过10%。因而，郑州在中原城市群的首位度是非常高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注意培育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

总结及展望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GDP规模最大的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区域经济基础很好，但长三角城市群横跨三省一市，已经形成杭州、宁波、南京、合肥和苏锡常等不同城市带，区域协调难度相对较大。作为长三角地区中心位置的工业生产中心，苏州是比上海更重要的区域货运中心，与周边其他城市的产业协同规模更高。珠三角城市群是人均GDP最高的中国城市群，区域主要为广东省内的九个城市，地域相近、文化相亲且交通便利，是七大城市群中经济融合度最高的一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处于中等水平，但产业协同度在七大城市群中属于较为落后的，仅仅略高于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汽车等产业的生产协同水平较好，其经济融合度处于较高水平且在提升之中，仅仅落后于珠三角城市群。此外，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人均GDP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发展的任务相对更重。未来，中国各大城市群的融合发展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创造更平衡、更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城市群的融合发展，需要以各个城市的产业协同和集群效应为经济基础，如此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除珠三角城市群外，其他各个城市群都涉及到了两个或以上的省级行政单位，各城市群在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上进行跨行政区的有效协同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各个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提升区域内的交通便利度，通过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接，使区域内的资源流动更加快速便捷。对于影响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

制和机制障碍，需要进一步打破，从而更好地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区域内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未来，中国各城市群的发展将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每个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

中国各城市群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未来？

通过以上FT中文网与G7公路货运大数据平台的发现可以看出，七大城市群不仅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有所差异，各个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受产业基础、区位、历史、交通和行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城市群的融合发展动力和特点各有不同。在各个城市群中，因为定位和产业特点的差异，各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国家提出城市群发展策略的意义有哪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城市群发展策略是基于中国现实发展条件，并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的成果。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而城市化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而是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像亚洲的东京、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地区，以及纽约等美国东北部地区等城市群均是如此。从国内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的不同地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在形成城市群。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区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并带动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也能形成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目前，城市群战略越来越细致，确实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七大城市群中，4个南方城市群的GDP全国占比达到44%，人均GDP达到10万元人民币，北方3个城市群创造的GDP仅占全国的19%，人均GDP仅有5.9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从G7货运大数据来看，2020年1季度以来，南方货运量全国占比继续上升，从57%增长到2021年1季度的60%。

那么，目前的城市群发展策略是否有利于缓解中国的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曾刚先生认为，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问题可能是被过分解读了。从历史角度来讲，南北经济历来就是不太对称的。从自然地理和人口分布来讲，人口和水资源等还是比较集聚于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人口等生产要素密集必然会带动经济的活跃度。新中国成立后，南北经济差异在一定时期内是缩小的。这主要是因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布局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主导的。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工业原料的分布等原因，很多工业基地布局在了北方。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只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比较短暂的、特殊的现象。七大城市群的布局中，有三个城市群布局在北方。如果政策能够到位，激发其自身活力，尤其是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释放活力，这些城市群有望获得很好的发展。在其现有的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南北经济的差异可能会缩小。

如何评价中国的七大城市群的发展潜力？

曾刚先生认为，每一个城市群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十四五期间乃至2035年发展规划中的新动力。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以及西部地区等每一个城市群都有不同的内涵。国家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不同的城市群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和定位，核心是通过城市群的布局去实现新的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在国家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每个区域的经济情况不一样，经济结构不同，整个市场环境的基础也有所不同。其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此，每个城市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定位，来制定支持自身发展的战略。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体量比较大，经济开放度高，所以这两个城市群更侧重于开放和创新方面的引领，更好地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G7公路货运大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货运量在其总货运量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其内部经济联系度越强。广东九市构成的珠三角是7大城市群中经济融合水平最高的，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城市在最近两年的融合发展有所提升。

从扩大区域经济影响力和提升区域融合发展的角度，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的发展？曾刚先生认为，从产业角度来讲，城市群如何形成更好的分工和协作以增强产业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是最核心的。如果没有产业的一体化，那么区域的一体化就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底层的市场需求作支撑。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都有产业一体化的内容在里面。提升区域经济的联系度和一体化，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有效协同。尤其是对于横跨不同省市的大型城市群，比如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长三角城市群等，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行政规划的对接等非常重要，此外，需要打破阻碍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设便捷的交通互联体系，形成更好的产业协同，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对于生活在某个城市群的普通人，城市群的发展会为其生活和工作带来哪些变化？曾刚先生认为，对于个人而言，城市群的发展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更好的选择。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可能逐渐实现均等化，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会相对缩小。同时，公共交通会非常便捷，我们不仅不必强求居住在城市中心，跨城通勤也会非常便捷。这样，我们未来对生活居住地的选择空间会更大。同时，城市群是多中心的，每一个中心城市有它的各自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整个区域的发展也会更加的平衡和可持续。在进行工作选择时，我们可以不必局限于某一中心城市，可以根据个人的职业技能，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更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域。

豫医保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出台 搭建未来10年医改框架

郭延 香港商报网 2021年4月27日

3月29日，河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了《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4月27日上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意见》的有关情况。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完成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实现更好保障病有所医的目标。

据介绍，《实施意见》全面对标对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结合河南实际，提出了六大方面的改革任务和24项具有河南特色的改革创新举措，搭建了未来10年全省医保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

完善保障机制 实现应保尽保

完善覆盖全民、依法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体系，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制度，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机制，科学确定救助范围；建立应对突发疫情等特殊情况的医疗保障应急处理机制，增强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功能，促进各类医疗保障互补衔接，提高重特大疾病和多元医疗需求保障水平。

加大财政对医疗救助投入 拓宽救助渠道

多渠道筹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均衡个人、用人单位、政府三方筹资缴费责任；加大财政对医疗救助投入，拓宽医疗救助筹资渠道；探索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逐步推进省级统筹；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强化分析研判。

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 规范诊疗

落实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规范诊疗行为；探索符合中医药服务特点的支付方式，支持提供和使用适宜的基本中医药服务。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依法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将监管重点从医疗费用控制转向医疗费用和医疗服务绩效双控制，加强医保基金监

管制度建设，构建完善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创新完善基金监管方式，建设统一规范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推进医保基金监管执法检查规范化建设，强化社会监督，动员全社会力量，依法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完善供应和采购 治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

积极推进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药品供应和采购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部门协同，治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提高紧缺专业医疗服务能力；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扎实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制度，遴选50种以上慢性病、常见病开展基层首诊；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制度建设，规范诊疗行为。

特别是发挥中医药在疾病诊疗、疫情防控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提供和使用适宜的中医药服务。

服务下沉 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提高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提升医疗保障服务质效；构建统一的经办管理体系，推进服务下沉，明确承办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工作机构，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实现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盖；探索推进市级以下医疗保障部门垂直管理，提高管理和经办服务水平；加强医疗保障领域法治建设，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全面提升医疗保障治理能力。

“户籍墙倒”加速城镇化

付一夫 香港《大公报》2021年4月15日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下文称《任务》），内容覆盖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表述：“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相关表述还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而此次《任务》特别突出了“落实”二字，标志着取消落户限制来到了必须要严格执行的层面，不能再有半点含糊。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新政涉及哪些城市？

按照《任务》的表述，这里的衡量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而非全局人口或市辖区人口。具体在城市层级划分上，参考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500万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至500万的城市为I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的城市为II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则属于中小城市。

换句话说，除了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外，其余城市都必须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如此一来，基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30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10座城市，大城市（I型）包括哈尔滨、长春、大连、合肥、昆明、太原、长沙、苏州、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14座城市。

而除了上述30座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都将真正实现“零门槛落户”——这当中，不乏贵阳、南昌、兰州、石家庄等省会城市，以及无锡、佛山等“万亿俱乐部”成员。伴随着“零门槛落户”的遍地开花，中国城市经济将步入新的竞争和发展阶段。

新政能够带来什么？

答案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更高层次推进。先说市场化。

众所周知，近些年受种种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重创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尽管凭借各方的努力与举国上下的团结一心，我们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推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并在2020年成为了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若想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我们势必需要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力。

正因如此，国家越来越重视市场的地位，不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还在公开场合和官方文件当中反复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从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角度来看，“零门槛落户”正是体现了我们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雄心，意义深远：一方面，人们的自由迁移和定居谋生都将不再受限，特别是那些身在农村、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转出，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供需错配现象同样会得到显著改善，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亦会大大提速；另一方面，户籍差别的本质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异，如今“二元户籍”即将成为历史，那些依附

在户籍上的种种福利与特权也将日趋淡化，不同人的身份地位将更加平等，发展机会也更为均等——这些同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说城镇化。所谓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国际经验一再表明，城镇化的推进，对于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与区域协同发展来说都有着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中国广大农民已经拥有了自主择业的权力，但农民进城后却往往因户籍问题而无法实现身份的转变，这便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以及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性改善。但在“零门槛落户”的新背景下，一个农民进城后，他的身份与可以享受到的福利都会真正有所转变，其收入也会大大提高，这也必将会反过来继续拉动中国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继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前景令人无比期待。

取消落户限制固然可喜，但却非一劳永逸，只因它并非是城市吸引人口来此生活发展的唯一筹码。最近几年，中国各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许多二线城市都拿出极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人才入驻，这当中就包括“零门槛落户”。然而，“抢人”虽简单，“留人”却不易，纵然二线城市有百般利好，仍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向一线城市“回流”。原因在于，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而绝非一处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便在客观上要求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步伐必须跟上。

不仅如此，城市福利的差别也不容忽视。当前，中国城市福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户籍福利，包括就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一系列带有一定竞争性的公共品，这些福利的获取是基于户籍本身，即需要居民通过获得本地户口才能够享有；二是非户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非正式的就业机会、秩序、信息、环境和文化氛围等一系列非竞争性的公共品，这些福利只需要劳动者来到这座城市即可享有，不同城市居民之间非户籍福利的区别，取决于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人口的迁移必然要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即便是没有了户籍限制，大家可以自由迁移，但多数人还是会倾向于选择到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福利增量的城市，即包括户籍福利与非户籍福利在内的总福利。

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剧情却是，尽管大城市的户籍门槛很高，户籍福利对外来人口来说遥不可及，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尽管小城早已全面放开外来人口落户，但却常常无人问津。

宁愿当大城市的非户籍居民，也不愿意当小城市的户籍居民，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人

口迁移的无序性，同样不利于各地区劳动力失衡局面的扭转与协调发展的推进。

正因上述种种，若想真正实现区域层面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让各地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除了户籍之外，我们还应大力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尽可能降低其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非户籍福利差异。唯有如此，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里扎根，进而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户籍墙倒，只是开始，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经济广角

读准读好一季度经济形势

香港 信报网 2021年4月27日

4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发布10组税收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创新发展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和活力。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综合税收数据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好，各项指标增幅较高，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其中，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力量。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0.5%，比2019年同期增长27.2%，两年平均增长12.8%。

“受益于税费优惠政策在企业端的落实及征管服务智慧化、数字化的转型，企业等市场主体延续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保障了实体经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有力促进了制造业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9.7%，比2019年同期增长20.2%。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力拉动了工业加快复苏。”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赵连伟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6.7%，比2019年同期增长19.6%，两年平均增长9.3%。

此外，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创新发展加快推进。今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比2019年同期增长41.6%，两年平均增长19%，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季度各项指标增幅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赵连伟介绍，一方面，今年一

季度，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一系列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加之春节期间多地倡导就地过年，企业员工到岗情况明显好于往年，有力促进了企业生产加快，效益提升；另一方面，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各项指标基数较低，带来了今年一季度各项指标增幅较高。

“所以，读准读好一季度我国经济形势，既要与去年一季度疫情背景下同比增长情况，也要看与2019年一季度无疫情情况下同期相比增长情况，在此基础上计算两年平均增长率，能更加客观全面反映经济运行态势。”赵连伟表示。

市场活力有效激发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赵连伟表示，近年来，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办涉税市场主体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为279.2万户，同比增长86%，比2019年同期增长34.9%，两年平均增长16.1%，市场活力有效激发。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今年一季度，新办涉税市场主体为275.8万户，占总体户数比重达98.8%，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在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带动下，今年一季度，民营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5%，两年平均增长14.7%。

新的市场主体在增加，原有市场主体的活力也在增强，效益越来越好。今年一季度，土木工程建筑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8%，两年平均增长15.8%。农机产品销售收入两年平均增长40%，农业机械化稳步推进。

“税收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上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以保企业保就业为导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去年应对疫情期间发力，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的获得感不断增强，进而带动就业和居民收入，为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跨区域联动 京港金融合作创新空间大

魏明德 香港 信报网 2021年4月13日

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逆全球化也有抬头之势，而中国未放慢对外开放脚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构建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中设置港澳发展专章，国家重点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北京享服贸区自贸区叠加

2020年9月中国服贸会上，中央宣布支援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位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准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服务业的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资源叠加，让首都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被赋予改革创新、促进服务贸易不断升级的新使命。这是首都核心地带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服务贸易、数位经济为核心主题的自贸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区”建设任务中，涉及金融领域共有102项开放创新举措，几乎涵盖了当前国家金融改革开放中各类金融业务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科技、资产管理等，同时支援外资加大在北京落地。

香港紧邻中国内地，又与国际接轨，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独有优势。香港与内地融合正在不断深入，两地金融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十四五规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令香港金融业大有可为，香港的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国际网络与经验将助力相关战略的顺利实施。

人民银行等四部委2020年5月出台《关于金融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金融30条”），明确重申支持香港担当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内地扩大金融业开放，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对香港金融业是重大的发展机遇，香港经济将继续受惠于国家金融改革发展。

数字金融是京港合作重点

香港与北京一直都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香港既是北京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实际利用港资超过1000亿美元；也是北京企业“走出去”和拓展海外市场的首选平台，北京在香港累计直接投资超过360亿美元，也有不少北京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

香港的金融服务、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非常具有竞争力。在CEPA框架下，香港在多个服务领域享有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在此过程中，香港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在与内地的合作中拥有绝对的先发优势。而在长期积累的国际经验与网络，也一定可以为北京高端服务业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疫情加速了香港金融科技的发展，以提升效率、降低营业成本。各机构逐渐发展远端开户、智慧投资顾问、完善电子化服务，强化监管科技、网络安全等。保险业也推出遥距投保这样的便利措施。将来中小企业可运用自身数据，得到更佳的金融服务，并解决中小企融资困难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要的增长引擎，要发展为区内的金融科技中心，推动跨境合作尤其重要，特别是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应用。

北京是国家金融监管中枢，也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而自身的坚实基础加上政策的倾斜，让粤港澳大湾区同样成为金融创新的沃土。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都非常有潜力。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愈来愈关注货币电子化发展。在人民币货币电子化的建立方面，中国已经超跃了许多发达国家。围绕北京自贸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总体方向，相信“数字金融”是京港合作发展重点。北京与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南北互动、发挥各自优势、加大合作，一同在“数字金融”并肩前行，同时助力国家推动人民币货币电子化。

科教文卫

大数据驱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香港 中评网 2021年4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近年来，浙江数字文化随着“八八战略”的持续深化发展，呈现极具地方特色的产业生态，打造以数字文化产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

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渊，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川表示，当前，依靠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及全面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浙江数字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持续优化升级，沿着一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科学路径持续发展，并从企业、产业、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层面同步赋能价值创造。大数据的交互融合、精准分析成为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增强文化自信、激发新一轮经济内生型增长的重要动能。

产业跨界融合推动数据使能创新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浙江数字文化产业涵盖文旅文博、影视直播、动漫游戏等领域并各具地市传统特色，依托数字技术与平台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融合创新，并依靠数据信息精准判断用户及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需要。数字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渗透性，不同领域的大数据交互有效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涵盖实体经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生态系统。数字文化产业正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升级使生活、生产、治理等多维度数据高频交互，加速市场需求信息精准采集。一方面，借助智能设备以及AR、VR等技术，能够更好洞察用户心理，刻画企业与用户的心理特征、行为模式、日常轨迹等内容，构建结构效用化、接口多元化的信息资源体系，增强资源禀赋，培育更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推动产业间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闭环管理创新；另一方面，不同市场主

体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一套多方位综合思维、综合性自我学习、迭代式知识更新的智能化生产与资源分配模式，增强产业内外部动态创新能力，加速与全球趋势、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外部环境的精准匹配，通过大数据背后的算法算力、决策模型找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通过业态裂变和跨界融合深刻推动数据使能和产业转型。

平台功能拓展助力价值链位次提升

市场多方主体深度融合实现精准的需求识别，推动文化产业相关的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扩展产业外延，并通过体系与生态创新为供给端改革提供动力。基于产业互联网打造的数字文化平台加速产业链、技术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推进智能化创新与数字化重塑，并激发竞争效应加剧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与必然性。在这一背景下，综合性数字平台为多方信息的交互提供了载体，为营商环境优化、销售模式升级、政务服务提升、新思想传播等多个领域提供了数据使能的空间场所。基于数字文化平台架构的新型业态有利于发挥长尾效应，培育数字化利基市场，打造“文化创意+数字/实体产品与服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从产业业态、模式等层面优化价值链。同时，功能的持续拓展，将平台功能从特定数据的交互延伸到具体的场景应用。从浙江的实践经验来看，数字文化平台涉及生产销售层面的个性化定制、电子商务、商业营销、线上孵化、购物拍卖、产业运作、全产业链服务等多环节，以及生活服务层面的在线教育、智慧医疗、数字流媒体、文化传播、文艺表演、互联网社群、新媒体等多领域，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大数据一方面搭建产业组织与用户间的桥梁，通过智能决策分析显著改善产业价值链管理，加速数字技术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赋能；另一方面，预测数字文化市场前沿发展，厘清相关产业政策、市场需求、文化参与、生产要素价格及其关系，赋能创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智能化分配、边际产出等，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等层面实现价值链增值和新价值创造。

数字文化认同激发内生发展潜能

以数据赋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在数字技术和文化产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广大人民对数字文化的逐步了解使用加速了数据流动及平台使用频率，同时也激发了数字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内生潜能。

数字平台为人民群众表达需求、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平台，将多样性、多维度、多层次需求映射到数字空间，满足了其在基础数字产品和服务之上更高层次的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等进阶文化需求。数字文化彰显了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能动性作用和主体性特征。通过数字文化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需求，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心理及情感上对数字文化建设的接受与认同，培育文化自信，是持续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内生型发展、巩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

以演出为中心 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香港 中评网 2021年4月27日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力”的新要求。这是对国有文艺院团现状提出的极具针对性的举措，也是对国有文艺院团数十年来改革发展更符合规律的导向性指引。

长期以来，我们在繁荣文艺方面取得的成绩，固然得益于狠抓创作，这一做法应该坚持。但也要承认，演出市场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我们没有像抓创作那样抓演出市场的培育和演艺生态的构建有直接关系。为此，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需要突出剧目和受众这两个重点，构建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的运营机制。

突出剧目和受众这两个重点

从实践看，一流院团的形成有两个关键：一是有能力把新创剧目变成常演剧目，注重把常演剧目变成保留剧目，下功夫把保留剧目变成经典剧目；二是重视演出质量和效果，并有保证演出质量的措施和制度。做到第一点，就是抓住了高品质剧目这个根本，做到第二点，就抓住了观众。只有院团的各项工作真正突出剧目和受众这两个关键，才能够最终获得成功。近期大家热议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做到了上述两点。

其实，比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爆红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歌舞团现象”。上海歌舞团不仅成功推出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还出品了另一部舞剧《朱鹮》，今年也将迎来第300场演出。无论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是《朱鹮》，上海歌舞团每场演出都要投入200%的精力，并有包括奖惩在内的演出监督制度。总之，就是因为注重抓好剧目、抓住观众，从而在演艺市场上取得成功。

构建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的运营机制

演出是院团存在的基本价值。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国有文艺院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任务。院团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最终都需要通过演出来体现。

三农问题

中国未来城市化趋势：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

香港商报网 2021年4月26日

城市化意味着中国的结构转型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城市还有集聚和创新的效应，这样的转型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根据我个人计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我国未来的城市化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区域再集中，另一个是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农村居民向县城集中。关于第二点，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实现县城和村庄的融合。

趋势一：人口再集中

人口再集中，指的是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然后到了城市化区域里又进行分散。这个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我把它称为人口的“大集中、小分散”。

比如，美国的地理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3亿多，但是摊开美国的地图，会发现美国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包括东海岸、西海岸、五大湖地区，以及佛罗里达州，其他地方人口较少，中西部经常开车一个小时见不到一户人家。另外还有日本，国土面积很小，但人口集中也非常显著，东京——名古屋——大阪这个高铁里程不到两个小时的狭窄区域里，集中了日本全国60%至70%的人口。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

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凡的：第一，进一步集聚会带来更大的效益。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深圳极有可能成为与硅谷并肩的高科技创新中心。第二，经济地理会发生大调整。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增加，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下降。第三，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虽然预计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至2028年开始下降，我国总体房价不会有大的增长，但是，新的城市化道路给城市化区域带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将可能导致这些中心城市的房价得以维持，甚至有所上涨，而非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要维持住就很难，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

由此，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从2012年春天就开始提出，但这个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太激进，比如让县级及以下城市全面开放，只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所就可以申请户口。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连美国都有户籍制度。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是用居

居住证代替户口登记，弱化户口所附带的公共服务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公共服务拉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高考是户口最大的福利，我们主张把地方高考和全国统考结合起来，全国统考面向那些户籍和学籍分离的学生，这将有利于大城市地区开放户籍的执行。

趋势二：县域经济的发展

未来城市化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县域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自2014年以来，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稳，跨省流动人数基本停止增长，开始了返乡创业的潮流。我们从这一现象中也要看到乡村隐性失业在增加，因为我国统计失业只统计城镇，不统计乡村。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下一步不能让这些脱贫的人再返贫。因此，我们今后的目标要从脱贫攻坚转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使农村继续发展。到2035年我国仍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农村，这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约三四亿人。即使最终我国城市化完成了，我估计全国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历史也将证明这一点。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哪里？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农业只占我国GDP的8%，15年前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已经来自非农业。未来要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核心必须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应是主力。举个例子，我的老家江西省新干县在过去十年实现了飞速增长，整个江西省近十年在全国GDP的排位上升得非常快，从垫底省份基本上到了中游，这与江西加入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大批人口返乡创业有很大关系。

新干县现在有35万人，支柱产业是箱包产业和灯具产业，都属于中低端产业，其箱包产业占到全国中低档箱包的80%。箱包的利润很低，一个箱包只赚5块钱左右，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就是个福音，因为到工厂里去干活，基本上四五千块钱的月收入就有保障，勤快一点上万也有可能。这些年村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开始买小轿车。农村居民买小轿车是富裕的标志之一，因为小轿车不能跑运输，完全是消费品。

类似这样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县城，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方仍然应该是主力。所以，有了产业，我们的扶贫成绩才能有保证，乡村振兴才有基础，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最终，乡村将成为中国很多人未来的宜居之所，进县城买房与留在村庄居住将形成平衡。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交通也将更加便利。农村地区单体房屋的卫生设施也可以实现自来水、下水系统、抽水马桶等基础设施的普及。如果能把农村变成宜居之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就实现了。

城乡融合发展重在推进六个转变

香港 中评网 2021年4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作为一个人口和地理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一过程不仅是在解决不充分发展或经济增长问题，也是在回应不平衡发展或共同富裕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结构特征已发生了变化，城乡融合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的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问题。例如：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并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在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转变，202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9.2%和32.7%；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农民工总量超过2.8亿人，城乡商品和要素呈现加速流动态势；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彰显，城乡居民自主开展经济活动的空间在扩展。

条件的变化意味着解决问题方案的调整，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着重推进城乡在主体结构、产业形态、要素流动方式、空间布局、公共产品配置格局等方面实现转变，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一是推进城乡劳动力结构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推动了城乡融合，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劳动力单向外流。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村经济社会活动往往缺乏高素质群体支撑，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连续性、有效性带来挑战。新发展阶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首先需要推进城乡劳动力结构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塑，即立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遵循市场经济逻辑，推动劳动力的分布变化。具体而言，城乡劳动力应能够获取大致相同的要素回报率，在此基础上，农村劳动力中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群体可以选择非农化流出，也可以选择在农村就业，城市劳动者也可根据个人意愿进入农村。农村高素质群体留在农村以及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可以促使农村形成一大批“职业农民”，这对于改善农村劳动力结构、发展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是促进城乡产业形态的转变。中国城乡关系调整的过程，也是城乡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城乡产业具有泾渭分明的边界：农村主要生产农产品，城市主要生产工业品和提供服务产品，城乡商品流通呈现出农产品和工商业产品

的对流。进入新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转变，会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转变，农村将进一步从提供食品拓展到提供生态、文化、休闲、体验等产品，并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中国城市化正从规模主导的粗放发展阶段转向质量主导的内涵发展阶段，城市建设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城市产业需要更多考虑生态功能，聚集在城市的工商业需要在内涵上转型升级、在地理上梯度转移。这些变化都将导致城乡产业边界渐趋模糊，产业融合化、交错化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内在需求。

三是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要素配置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主要表现为要素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要素依据市场价格实现从城到乡的流动是罕见的，这种要素流动方式是二元城乡结构下城乡发展失衡的一个表现。当前，城乡要素范围被大大拓展，除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外，还增加了管理、技术和数据等新要素，数据成为新要素并对其他要素的再配置产生催化作用。此外，农村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发育壮大、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客观上也需要城市要素流向农村。综合上述两点，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配置。

四是促进城乡空间布局转变。伴随城乡人口大规模、频繁化流动，城乡空间格局也发生深刻变化，集中体现为：部分农村户籍人口以农民工方式流向大中城市以获取相对较高收入和发展机会，并因收入提高在县城、中心乡镇购房置业，偏远地区的农民则往往通过易地搬迁，形成在中心镇或中心村的集聚，部分农民生产地和生活地分离。上述变动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空间结构。传统的城乡空间边界是清晰的，且农民生产地和生活地是重合的。现在，城乡之间出现空间交错。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把握这种城乡空间重构的趋势和规律，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空间转变，充分发挥县域在城乡对接中的枢纽作用，将县域城镇化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

五是促进公共产品配置格局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面临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格局，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配置差距较大。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202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降至2.56倍，但城乡基本公共产品配置的不均等仍较为突出，这也成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未来“三农”工作的重点将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把握这一机遇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公共产品在城乡间的不平衡配置。这包括：对标农村承担的粮食安全和生态保障等基础功能，将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农村，通过财政资源倾斜等方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的公共服务获取水平，缩小城乡居民在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等生活型公共服务方面的落差；针对不同地区因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公共产品供给能

力差异，需要通过国家财政形成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六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或体制机制调整具有关键作用。1978年以来，中国推进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城乡制度变革，对城乡结构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与时俱进对相关制度进行评估和研判，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城乡体制机制的转变。这包括：着力推进土地等城乡要素的制度变革，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通过细分产权扩展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权，形成城乡要素与农地的多种组合方式；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国家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激活城乡居民的参与度、创造力，使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城乡居民真实获益的过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强化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含量；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将农业农村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使城乡融合发展更显著地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

社会观察

便宜的“临期食品”撑起百亿市场

李文慧 香港《经济导报》2021年4月26日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都有过这样的购物体验：晚上在超市临近关门的时候，买到超低价促销的食品。超市通常在一些新鲜食品接近最佳赏味期，但又未变质的情况下，做打折处理，一些食物几乎可以以不到平时一半的价格买到。

从在线到线下，四处可见各种“临期商品专卖”，临期食品在网络上的曝光率持续上升：豆瓣、知乎上有专门的话题和讨论，B站上还有UP主的临期食品开箱测评和种草；打开淘宝，输入“临期食品”，“低价清仓”等关键词，可以发现许多月销超万件的商品；全国不少城市还诞生了一些区域型临期食品品牌以及实体店连锁，临期食品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在这背后孕育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艾媒咨询数据统计，2020年中国零食行业市场规模达3万亿元，即使按1%的库存沉淀计算，临期食品行业市场规模也会突破300亿元，市场需求和市场潜力是显而易见的。“清库存”的概念在服装行业虽被提及多年，但在食品领域，它正在撑起一个百亿市场。

中国年轻人爱买临期食品？

食品的宿命只有两种：被吃掉或者被扔掉。最近，便利店因扔掉大量临期食品而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一场关于食品浪费的争议。因为许多线下的各大商超、便利店，追求的是“新鲜”、“高质量”供应，因此许多食品在保质期还剩三分之一甚至更长时间时，

就会立刻被下架、扔进垃圾袋，让人看了不免觉得有些浪费。

但在要不要购买临期食品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的。在某APP上，有一个题为“你会购买临期商品吗？”的问答帖，有许多年轻人在帖子下面分享自己购买临期食品的快乐，也有许多人分享如何“薅羊毛”的经验，中国人崇尚节俭，临期食品市场的发展莫过有一半归功于此。不过也有一名网友表示，虽然自己觉得买临期食品既划算又省钱，但会觉得有一点“丢人”，怕别人觉得自己“穷”，而自己的朋友则是担心长期食用临期食品，对健康不利。

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临期食品”的概念。临期食品，是指即将到达食品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属于安全食品的范围，如超市的“临期食品专柜”销售的即是临期食品。所谓临期食品一般都标有“临近保质期食品”、“临期食品可放心食用”等提示用语，可以降低消费者忧虑，消除其心理障碍。

目前临期食品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宠”，一名临期食品销售店店主笑称，“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精明的，既然同样能吃，为什么不买更便宜的、性价比更高的呢？”尽管如此，国内大众对临期食品的认同程度仍不算高，但在国外，人们对临期食品则有着独特的喜爱，因为售卖临期食品是一种公益行为，卖掉的钱都是用来捐给慈善机构而非盈利手段。

临期食品：“存在即合理”

在食品行业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当一个食品的保质期还剩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时，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超就会拒收，同样在线渠道也有相应要求。比如一包饼干的保质期是12个月，如果距离出厂过了4个月了，那这个饼干就没机会在超市上架了，这也被称为食品流通行业的允售期。

允售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消费者可以买到新鲜商品，但也让大量被供应链耽误的食品成了库存货。比如那些进口食品，漂洋过海进入中国市场，经历了物流的一连串的路径下来，刚见天日可能就超出允售期了。

食品从品牌商、经销商、零售商再到消费者手上，每一环都顶着保质期的压力在赛跑，完美的流通效率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实际上，临期并不意味着过期和变质，他们只是被供应链“耽误”的一批库存商品，所以临期食品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

以“低价、去品牌化、物美价廉、满足需求”为特征的消费降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一项“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社会驱动力分析”的调查显示，有52.5%所谓中国消费者购买临期商品的重大驱动力是“低价购买需要商品”，所以商品价格及性价比始终是影响消费端选择一件商品与否的重要因素；其次，是“为了环保，减少食物浪费”而购买临期食品，占比约15.3%；“未试过或尝试性购买”的占14%。中国零食市场规模

巨大，每年因流通效率就能导致食品损耗达到千亿元，站在环保角度上来说，临期商品的存在有利于减少销毁食品的浪费与返厂再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日本便利店鼓励购买 临期食品获政府支持

临期商品在外国又是怎样被对待的呢？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在食品生产、管理方面有着严苛的把控，超过临界期的食品都会被立刻淘汰。根据日本国内媒体的统计数字，日本每年因此浪费的食品数量，是联合国粮食援助的2倍。

面对国际社会持续的质疑声，日本社会也不得不做出回应，先从最大的便利店品牌7-11尝试改革，出台了一些鼓励措施，对于购买临期食品如盒饭、面包等的顾客，给予积分奖励。那些距离保质期五小时以内的食品，自动成为优惠对象，或者内销，当做给店内员工的福利。7-11从2019年秋天开始，在全日本的2万多家便利店同时推行这一政策，罗森便利店也从在部分重点区域尝试推行。

日常的食品报废，加重了那些深受人工成本增加困扰的便利店的运营负担，因此，减少食品浪费，对于加盟店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有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缓解运营压力。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也曾在记者会上申明了减少食品浪费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他表示，在目前这种劳动力不足、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各便利店品牌应该与加盟者积极沟通，共同采取对策。

挑选临期食品也“讲技巧”

总之，随着越来越多临期食品的出现，临期食品的市场价值也逐渐被发掘。从最初通过小规模店铺进行临期食品的折扣销售，到线下直营店的出现，再到临期食品被放到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行业的受关注度正在不断提高，而临期食品的市场的发展也将走向规范化、规模化。

不过挑选临期食品也有“门道”，专家提醒，如果一种食物的营养价值很低，多吃不利于健康，那么它打多大的折扣，买来都不合算。比如说，糖果、糕点中糖分或油脂过高，营养素含量太低，只可偶尔食用，不能经常吃。如果因为商场打折、赠送、贪便宜而把它们拿回家，回家之后显然是要马上吃掉的。这样就会降低饮食的营养质量，实际上最后反而是得不偿失。因此，购买天然、优质、营养素含量高的食物，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最合算的。

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只要商家明明白白地标注清楚，不设欺骗，如果价格也很优惠，消费者可以自己判断和选择购买。“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省钱、实惠已经成为众多“都市年轻打工人”选择临期食品的理由，临期食品市场必然不会缺少客户，而且对于质量尚好食物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吃掉，而不是被浪费。

延迟退休配套措施如何完善

香港商报网 2021年4月12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将坚持小步调整原则

有人认为，延迟退休意味着岗位减少，年轻人工作将更加难找。对此，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表示，静态看，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一定冲击。劳动力供给增加，自然腾退的岗位减少，短期内大龄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但这种冲击是有限的、可控的，不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从劳动力供给端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连续8年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仍将加剧，第二次出生高峰的人口（1962年至1972年）将进入老龄期，老年人口进一步增多，“一升一降”，在现有退休年龄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甚至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从劳动力结构看，大龄劳动者与青年人就业岗位的替代性不强。“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更多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能否提供足够的、与青年人就业能力、意愿相匹配的岗位。”莫荣说，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特别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的能力不断增长，青年就业有广阔空间。

“此外，延迟退休改革将坚持小步调整原则，若采取每年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的方式，每年因延迟退休而多出来的劳动力不会太多，甚至会被每年减少的劳动力相抵消。所以，年轻人没必要过度担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应加大对大龄劳动者就业的保障

迟福林介绍，我国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援助体系，对于大龄失业人员也有相应保障措施。

根据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对参保缴费满1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可根据其参保缴费年限，发放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参加过失业保险的临近退休的大龄劳动者，可按规定享受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对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面对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建议继续贯彻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强化对大龄职工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多措并举提高大龄劳动者技能水平。”莫荣说。

“下一步应加大对大龄失业人员保障力度，助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莫荣说，例如，国家可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各类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鼓励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湘泉则认为，大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历练，有深厚的经验技术积累，在很多就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不应该简单把大龄劳动力看作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从国际经验看，延迟退休有利于提高大龄劳动者参与率，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年长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进而促进消费需求和就业增长，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同样拥有广阔前景。”

延迟退休、持续缴费，将提高退休后养老金水平

莫荣介绍，目前，我国养老金待遇计发有很强的激励机制，退休时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多缴费1年，退休时基础养老金提高1个百分点；晚退休1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减小、个人账户积累额多1年记账利率，月领取额增多；由于缴费和计发基数增加，待遇调整也会相应增加。

“延迟退休，继续工作、持续缴费，将会增加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水平。”莫荣说，工作期延长了，会增加个人劳动期间工资收入，总的看，是有利于个人的。

此外，延迟退休后，员工继续留在工作岗位，将无法回归家庭帮助子女带孩子，“生了孩子没人带”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对此，迟福林坦言，受传统家庭文化影响，我国老年人在家庭照顾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照顾隔代后代（孙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延迟退休采取的是渐进式方式，节奏总体平缓，改革前期退休的人只延迟几个月，对家庭照料和育婴活动影响非常小。而对年轻一些的劳动者，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有较为宽裕的时间来对家庭生活进行规划。

“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同步完善育婴托幼政策，促进家政服务业更加规范，入托更加方便，切实解决女职工生育后顾之忧。”迟福林说。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认为，延迟退休不能“单兵突进”。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环球视野

亚洲何以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香港 中评网 2021年4月24日

4月18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两份备受

关注的年度旗舰报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报告认为，今年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5%以上，亚洲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重要引擎。

“领跑”世界经济的亚洲

亚太智库研究员刘木子文章表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亚洲经济在2020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负增长，但总体表现好于世界其他地区。今年，亚洲的经济发展态势继续好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将亚洲经济增速上调至7.6%，高于去年10月份预期的6.9%。

针对在后疫情时代处于“领跑”地位的亚洲经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指出，亚洲经济体将更加积极有为，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善，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作出更多的贡献。该论坛理事、俄罗斯联邦与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合作事务总统特别代表祖布科夫也表示：“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近年来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毋庸置疑，亚洲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

早在去年年底，摩根士丹利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相比西方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新加坡等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将更早摆脱疫情影响，在2021年步入“金发姑娘”阶段（指一个经济体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刚刚好”状态）。

凭什么是亚洲？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急剧衰退的大背景下，亚洲能够脱颖而出，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亚洲在抗疫方面表现较好，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调动全国各地4万多名医护人员集结湖北，中国用一个多月时间将疫情控制住。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控政策迅速到位，而且民众奉行遵纪守法的文化，公共卫生意识比较强，对政策能够理解和配合，便于政府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另一方面，亚洲多数国家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科技手段，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亚洲的应对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口罩、反禁足集会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因为控制疫情较为迅速，亚洲经济受损程度相对欧美等国家较小，经济的反弹也比较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为4.9%，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衰退仅为0.8%。

第二，亚洲经济复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在东亚和印度，更多投资正在流向域内科技初创企业。鉴于世界半数科技巨头的总部设在亚洲，而武汉、雅加达、仰光、海得拉巴这四个创新中心正在迅速崛起，亚洲正在成为技术进步的关键推动力。主导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巨大的创新资源以及性价比较

高的高质量人才。亚洲各地识字率大幅提高同样促进了生产性就业。据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将占到全球的60%以上，而美国和欧洲的占比分别仅为4%和8%。

随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发展壮大，消费市场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偏爱国货而非西方进口产品的趋势正在形成，而日趋严格的监管工作也在淘汰质量较差的产品。这就孕育了阿里巴巴、三星、丰田、华为等世界知名企业，扩大了亚洲在全球的影响力。

第三，亚洲内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助、亚洲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持都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首先，亚洲拥有日韩等发达国家，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和技术，但这些国家都面临严重老龄化，需要和外部合作；其次，中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大量的需求对经济可起到拉动作用；再次，东盟作为亚洲的一个重要板块，投资贸易都非常活跃；最后，印度等南亚中亚国家也不能忽视，南亚和中亚的18亿人口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并且和非洲南部一样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这四大板块在亚洲具有互补优势，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下，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使得亚洲经济的发展呈现蓬勃之势。

对此，李保东先生在此次博鳌亚洲论坛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性、全球性的互联互通倡议的有力衔接、对接，对于区域经贸合作、疫情后经济恢复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领跑”亚洲经济的中国

在“领跑”世界经济的亚洲中，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率超过9%。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2.3%，虽然创下新低，但这一成绩在去年仍然领跑亚洲。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中国的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开始触底反弹，增长3.2%；三季度增速继续加快，增长4.9%；四季度增速达到6.5%。单就四季度而言，增速已经达到疫情前水平，甚至比2019年四季度增速(6%)还要高。2021年，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达18.3%。

德勤中国首席高管菁英中心全国主管合伙人施能自表示：“作为全球首个在疫情后重启经济的地区，加上各行各业广泛采用数字化手段运营，中国无疑将在未来一年领跑全球经济复苏。”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高级经济师埃利奥特·克拉克说：“2020年，世界经济收缩4%，而中国经济增长2%左右。202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约6%，其中发挥关键支持作用的，将是中国近10%的增长率。”

以上例子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进而坚定其对后疫情时

代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展现出的确定性最为突出，而这种确定性正内化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推动力。

一方面，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这种“确定性”给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最早实现了疫情防控常态化，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此后，虽然出现了零星散发病例，但是中国各级政府迅速行动，依靠严格的防控机制和措施，避免了疫情扩散。良好的疫情防控形势，给在华外商营造了稳定的经营环境，也为中国经济保持良性运转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这种“确定性”提升了国际社会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预期。疫情发生后，有人担忧，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是否会延缓甚至中断？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面对疫情冲击，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举措稳外贸稳外资，并且做到了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此外，从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放开多个金融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从举办服贸会、广交会和进博会，到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一系列既定举措如期实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新措施陆续推出，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增强了通过中国开放政策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信心。

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形势

李迅雷 香港《大公报》2021年4月14日

进入疫后时代，伴随着经济的复苏步伐，人们对于通胀上行的预期逐渐得到增强，基础原材料类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这无疑会引发全球通胀风险的升温。今年全球通胀究竟会达到多高？

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通胀”水平，不管官方公布的PPI、CPI或PCE数据如何变化，都很难改变人们对通胀的看法。这背后的实质在于，全球为了应对疫情冲击都在实施“货币大放水”。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飙升至7.4万亿美元，增幅高达76.8%，同期美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25.4%，创下历史新高。2020年欧元区和日本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分别录得11.7%和9.1%，也均处于历史上偏高的水平。货币泛滥的结果必然引发人们对于通胀的恐慌。

但所处的收入阶层不同，对于通胀的切身感受很可能也是完全不同，“分层”特征决定了讨论通胀问题时很难笼统地一概而论。早在2010年，笔者就提出把CPI作为平民通胀指数，把股价指数作为中产通胀指数，而把豪宅当作富人通胀指数。这实际上意在表达，实体经济通胀与资本市场通胀预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实体经济通胀可控

历数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的高通胀，我们发现，2012年至2013年是一道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在2012年之前，中国先后在2004年、2007年至2008年和2011年经历了三轮显着的高通胀时期，这三个时期CPI同比增速都曾达到过5%以上，而与之相伴随的是，PPI增速在同期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涨幅。但是在2012年至2013年之后，中国的高通胀开始步入“结构化”时代，高通胀时期CPI增速和PPI增速之间的联动性下降。

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由于全球原材料类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中国带来的通胀压力，事实上也是结构性的，表现为年内PPI增速的快速回升，但CPI增速或将波澜不惊。

一方面，去年同期CPI增速的读数较高，2020年前四个月中国CPI的同比增速都在3%以上，高基数效应将压制今年CPI增速的走高；另一方面，受到猪周期因素的影响，年内中国生猪供给预计较为充裕。一般来说，能繁母猪存栏变化领先猪价十至十二个月，根据能繁母猪存栏的数据来看，2021年下半年中国的猪肉供给相比于2020年同期要高出20%至30%左右，这意味着猪价在今年存在着下行压力，而猪价是影响国内CPI增速走势至关重要的变量，猪价的走低将会对CPI增速构成显着拖累。

资产通胀出现回落

即便是在工业品价格内部，也存在着“结构性涨价”的特征。一方面，全球定价的商品价格涨幅要明显高出主要由国内定价的商品价格涨幅，比如今年以来钢铁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幅度要低于原油和工业金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比较高的原油，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也要超过铜、铝等工业金属。这意味着从PPI同比增速上来看，上行速度并没有像个别商品价格涨幅所表现出的那样剧烈。笔者预计，年内工业品价格的高点应该在三季度出现，国内PPI同比增速下半年趋于回落，全年增速中枢相对温和。

2020年受疫情影响，CPI高开低走，与此对应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万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低收入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更大，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低7个百分点之多。但202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增速却大幅上升，估计奢侈品消费额的全球占比，比2010年提升了一倍，即达到38%。此外，豪宅的涨幅远大于全国商品房指数涨幅，尤其以深圳、上海等一线或新一线大城市房价涨幅为甚。

与中国类似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和楼市在去年也是空前繁荣。这是因为，疫情冲击了实体世界，而各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大量投放货币和实施财政补贴，于是“货币之洪水”大部分流入到资本市场，让资本世界空前繁荣。这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所谓“富人通胀、穷人通缩”。

主要经济体通过超发货币和大规模举债来刺激经济的方式，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

加剧社会分化和激化社会矛盾。全球经济的根本担忧是长期和平下改革动力不足，游戏规则不变使得社会结构扭曲。而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所采取的逆周期做法，似乎解决了流动性危机，属于“无痛疗法”，既保护了企业家（富人）利益，也补贴了穷人，但从数据上看，却加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资本收益远大于补贴额。

但2021年的情形则与2020年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实体世界已经开始复苏，中国则率先收紧货币，出现了流动性拐点。那么，资本世界的货币流动性放缓，甚至部分流向实体世界。原油价格是资本世界的“通胀之锚”，实体世界复苏越强劲，对资本世界的资产估值似乎越不利。

既然这轮牛市主要不是靠盈利增长驱动的，而是估值水平提升驱动的，那么，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由原油等大宗商品涨价推高的通胀预期，显著抬升了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进而就会拉低估值区间。

通胀不是加息理由

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通常是基于对未来经济的变化预期去考虑，利率要与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相一致，而物价的波动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短期性因素较多。这轮全球经济的复苏是因为疫情好转和财政、货币政策宽松的共同结果，但并没有解决疫情前各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2020年全球经济债务率水平大幅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水平较2019年底分别提高36.8个百分点、28.1个百分点和36.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正如前文中所述，全球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扩大。2021年经济反弹之后，2022年可能重归需求乏力的低增长中。因此，把通胀作为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

就美国而言，人们对于疫苗普及后美国经济的快速恢复抱有很大期待。但至少目前来看，美国经济中占比接近70%的服务消费整体仍在低位徘徊，服务业的就业状况也不理想，从事服务岗位工作的失业率仍超过10%，不仅远高于疫情前的个位数水平，也显着高于制造业岗位工作的失业率水平。而且即使等到疫情对于经济的限制解除，服务业的完全恢复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因此，美联储对于经济的呵护意愿依然较强，强调“实现充分就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关注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状态，也注意到失业在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对于通胀目标的修改，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美联储不会把通胀的短期上行作为调整货币政策的理由，年内预计其将保持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变。

就中国而言，全年CPI和PPI增速估计都处在温和通胀区间，并且也不会超过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CPI在3%以内的目标。而且央行自疫情过后事实上已经收紧流动性。

疫情之下，行政性调控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如两会提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

准调控”，估计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也会加强，在这种背景下，再上调利率，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政策调整上这次强调“不急转弯”，对于这一表述，有些人看到的是“不急”，有些人领会的是“转弯”。实际上，政策转不转弯取决于经济热度，而且不是以短期经济数据的冷热为依据，因为政策应该保持适度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不能说变就变。过去曾经提过货币政策的“出其不意”，现在则更强调预期管理。因此，没有理由担心今年政策会大幅收紧。

时事观察

专家热议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

平台经济是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结果，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样态。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82.28亿元。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起重大典型的垄断案件，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新阶段，释放了清晰的政策信号，即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和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创新发展。该案的调查处理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和示范作用。本栏目搜集和整理了多位专家学者的言论，以供参考。

重点是制度建设和监管理念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中有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热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欧盟都充满着理论难题和实践挑战，原因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时代。第二个关键词是“盲点”，关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当前还有很多我们看不清楚的地方，比如数据权属问题，因为看不清楚，目前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制度也存在缺失。第三个关键词是“难点”，比如平台企业行为的后面是数据行为，而数据行为的背后是数据权利，当对数据权利本身认识尚不清晰时，我们对平台行为的判断就会出现问题的，反垄断法何时启动就成为很大的问题。第四个关键词是“重点”，这意味着我们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应该有所选择，工作思路要清晰，抓大放小是必要的，重点应当放在制度建设和监管理念两个方面。在监管理念方面，我们的监管理念要转型，那就是要由包容审慎的监管转变为积极监管、协同监管、审慎监管和依法监管。过去一

些东西看不清楚时，审慎包容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对平台企业的认知包括对数字经济规律的认知清晰了很多，这个时候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监管就可以积极一些。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科技已经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只有一个数字经济监管机构或者部门，因此既需要进行分工监管又需要形成监管的协同机制。依法监管是要实现监管的常态化，要坚持竞争、创新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并重，三者缺一不可。（中国经济网 2021 年 4 月 10 日）

要强调发展和监管并重的监管原则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吴韬**：美国强化反垄断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社会两极分化，近年来所谓“新布兰代斯主义”回潮，其核心观点是把反垄断和政治挂钩，从宪法经济学出发，认为集中的市场结构会侵蚀以分权为基本理念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美国对市场干预是十分审慎的，可用的市场监管工具非反垄断莫属。欧盟对平台反垄断一直比较重视。中国和美国、欧盟相比，我们强化反垄断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强化反垄断，是因为新兴产业发展到了发展与监管并重的阶段，以及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有关。从目标上看，我国强化反垄断，除了传统竞争政策中关于提升竞争效率、消费者福利以外，还特别强调规范秩序和安全。从监管的原则上看，首先，要强调发展和监管并重；第二，要平等保护和公正监管；第三，要发挥我国存在各种监管工具的制度优势。在监管路径层面，要通过多层次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具体规则、反不正当竞争、个人数据保护、消费者保护权益等方面法律，事前规制优于事后规制，利用约谈、行政指导等多元化执法手段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搜狐网 2021 年 4 月 11 日）

探索互联网竞争政策的中国道路 北京大学《比较》杂志部主管**陈永伟**：面对互联网巨头发展带来的问题，欧洲“用锤子来砸锁”，通过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DMA（数字市场法）、DSA（数据服务法）等严厉的法律限制巨头的发展。美国“一把钥匙想去开不同的锁”，试图用反垄断协调竞争中的所有问题，并带有很明显的党争色彩，时松时紧。因此，中国要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应在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去解决问题。中国互联网反垄断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反垄断不能解决贫富分化、隐私保护等问题；第二，竞争产生的问题并非都能够用反垄断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互联网巨头的兴起若只是时间上的相关关系，就很难用纯粹的反垄断去解决，竞争过度、竞争无序问题难以用反垄断法进行解决；第三，有的垄断问题并非由市场力量导致，而是由行业规则门槛过高等行政力量产生的。因此，解决问题不能单独依赖反垄断，而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探寻多种解决路径。（新浪网 2021 年 4 月 12 日）

日)

以实证方法助力反垄断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易芳**: 首先,对于相关市场界定中的网络效应和免费产品问题,实证研究者拿到数据后可以解决。拿到实际价格的变化和销量的变化或用户数的变化,可以进行实际弹性的估算,只要样本时间足够长,网络效应就会反映在估算的结果里。对于免费产品,可以用另外一个用户的其他成本代替价格变量,进行测算。其次,反垄断的横向协议案件的最优罚款的比例被诟病太低。经济学上,最优罚款比例可以通过查处概率,利润率,行业弹性,违法行为导致的价格提升比例这四个变量,对每一个案件做最低的威慑效果,来进行测算。查处概率的研究有调研和实证两种方法,实证的方法又包括“生死链”和“捉放曹”,其中生死链应用最多,也叫出生死亡过程。它的直观含义就是研究卡特尔的查处概率时,每一个卡特尔在时间轴上有出生的时间和死亡的时间,当时间足够长的时候,其马尔卡夫过程(Markov process)会趋于稳定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就是查处概率上限。把测算出的最优罚款比例回归在实际返还比例上,再加上案情、宽恕制度、公司性质的考量,建立简单不规则模型,可以研究实际的反垄断实践的一些特征。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得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研究结论。第一,实际罚款并没有考虑最优罚款的理论,这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可以进行优化。第二,中国的反垄断执法非常专业,内资和外资公司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但通过样本选择可以对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第三,有行业协会参与的案件比例、罚款比例会相对降低。第四,横向案件比纵向案件的罚款比例低,这和国际观点有一些背离。今后要进一步实现罚款的最优化,需要把这些结果和调整方向都纳入。(新浪网 2021年4月12日)

算法共谋法律规制的困境与进路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玉辉**: 算法对传统市场结构条件要求有所突破。首先,算法共谋对市场集中度的依赖性开始降低。其次,算法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导致共谋形成的成本降低,更易于形成算法共谋。再次,算法的理性使得共谋维持更加理性,突破传统共谋维持困难的窘境。欧盟列举了四种算法:平行式算法、信使型算法、监测型算法和自主学习型算法。前两种属于典型的共谋行为,可以把它纳入到垄断协议的框架进行规制。监测型算法可作为独立的垄断协议行为的辅助行为对待。自主学习型算法通过人工智能形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行为,在审慎监管的理念下,对没有人为痕迹的自主学习型算法应该持包容的态度。(中国经济网 2021年4月15日)

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监管部主任**李强治**：近期出台的平台反垄断指南是对中国的道路怎么走的一次系统性探索。但指南的出台只是一个起点，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首先，如何将新要素引入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中。全球对平台的探讨主要为数据集中这一问题，但数据集中如何衡量，指南里面没有明确说明。此外，传导效应是一个重要关注点，传导效应会增强平台的垄断地位。但数据的开放流通共享能促进创新，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护竞争和促进创新中保持平衡。其次，指南里面列出的垄断行为，如算法共谋、平台定价、轴辐协议、大数据杀熟、杀手型并购等，是我国互联网领域常见的商业行为，其合理性边界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中国需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强监管是不是一定会削弱平台企业的竞争力。二是美国的平台企业已经实现全球化经营，其平台企业的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美国的平台企业在全球面临的严格监管会不会成为美国平台企业塑造全球竞争力的新的来源。（经济参考报网 2021年4月29日）

深刻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

准确认识大安全格局下的国家安全概念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方**：一、当前对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错误认识。对于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一直存在两个极端化的错误观点，一个是忽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统国家安全认知，即对国家安全狭义化认识，仅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反间防谍工作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安全泛化观点，其代表性观点即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也是对国家安全学是否存在独特研究对象、国家安全学科是否能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质疑。这两种错误认识都是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面临的思想阻碍。传统国家安全认知在社会层面根深蒂固，无法真正体会“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凸显构建大安全格局的必要性；国家安全泛化认识曲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无限扩大国家安全概念，影响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正常开展。因此，构建大安全格局，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首先要厘清国家安全概念，明确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

二、坚持法治思维，界定国家安全内涵。从国家安全基本法律规定出发理解国家安全概念，是界定国家安全内涵的科学路径。第一，国家安全的主体为“国家”，民族、地区不应成为国家安全的主体，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应当以国家安全为基础，国家安全以人民利益为主要内容；第二，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为国家重大利益，即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第三，外部不受威胁、内部没有危险是国家安全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具备三个层面特征，首

先是安全的客观状态，其次是人民主观感知的安全感，最后是安全化，即特定的安全风险经过一定的程序进入了国家安全决策治理层面，并因而实现了国家安全的理想状态；第四，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领域是国家治理重要领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因此，要正确理解国家安全，必须把握三个方面内涵的关键词：国家利益、重大风险、治理理念。人民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政治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核；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理想状态，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目标；构建大安全格局，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

三、坚持系统思维，确定国家安全外延。大安全格局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总体性。二是关联性。三是系统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类型区分为主线，通过列举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保护和极地、深海、太空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而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整体与各个国家安全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总体国家观的体系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重点研究国家安全整体与不同国家安全领域之间的关系。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需要融合内部不同领域、关系、要素，统筹协调才能达到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各种领域、关系、要素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内有机、有序不断磨合，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光明日报》2021年2月4日）

深入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冯鹏志**：坚持把发展作为安全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根基，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发展阶段，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已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而且也更加深刻地关联着国家安全利益，并可能更加直接地引发出现实安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z把发展质量与安全的关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增强发展竞争力，坚持以发展质量的提升赢得发展主动权，从而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应对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安全挑战。

坚持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的基本支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和高水平开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

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尤其是面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多变、民族分裂主义和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以及诸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压力，稍有不慎或应对失当，就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各种矛盾困境把握得更全面透彻一些，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以自身安全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稳定展开。（《学习时报》2021年2月26日）

构建大安全格局，需确立六大安全理念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一是系统安全理念，就是要明确“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在国家安全 and 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进行具体分析”；要明确“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太空安全”；特别要明确“高水准的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在于通过强力来‘维护’，更在于通过合理的系统化的社会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实现国家安全虽然必须要有强力维护，但更重要的在于社会体系的合理性、先进性，在于国家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变革，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机能的自组织系统”。

二是共同安全理念，就是“大家都安全”的理念，就是要明确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把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并且把一个国家内部所有国民的安全置于平等地位，在保障本国国家安全的同时对他国的国家安全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在保障军政要员安全的同时对普通国民的安全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最终构建起任何国家和任何个人都能获得基本安全的“国国家安全、人人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

三是合作安全理念，就是要努力摒弃安全领域的军事冲突、政治对抗、零和游戏，建立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安全模式，使安全问题能够在合作的框架下得到更好的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

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四是相对安全理念，就是要明确追求绝对安全不利于总体安全和长远安全，在安全实践中应努力摒弃追求绝对安全的行为，在可能的条件下追求相对安全。为了体现“相对安全”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在界定“国家安全”概念时，加上了“相对”一词，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若干方面“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在现实中，包括国家安全实践中，追求绝对安全必然造成许多新问题，甚至使现实变得更不安全。在系统思考国家安全各种要素和现实环境的条件下，人们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相对安全，而不是满足于更低层次的相对安全。

五是有效安全理念，就是将“有效”作为衡量国家安全工作的标准，而不是只看愿望是否善良、态度是否坚决、行动是否果断、是否敢于不惜一切代价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集中论述国家安全问题段落的起始语。由此可知，在系统思维下确立有效安全理念，对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六是可持续安全理念，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在系统思维下，不仅要在空间维度上全面认识、全面布局、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而且要在时间维度上全面认识、全面布局、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只有确立可持续安全理念，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同时确立大安全理念和大安全格局，才可能确立科学合理的国家安全方略，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安全远景目标。（《人民论坛》2021年3月中）

深刻认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时代内涵 中共洛阳市委党校**赵家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等”字意味着开放性，国家安全体系不仅限于这些相关领域。随着科技发展和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国家安全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国家安全涉及深海、太空、极地等安全问题，共有19种之多。从长远看，内涵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不断出现，一些危及国家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将随时被“置顶”，并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一句话，要在伟大斗争中不断赢得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以更长远的眼光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课题，把握国际安全观的时代内涵，以更有力的举措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人民日报》2021年4月15日）

《生物安全法》的意义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天宝**：生物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进一步构建了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生物安全法的颁布施行，不但标志着生物安全风险预防体制机制朝成熟完备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时也为生物安全领域法律规范的制定、阐释、修改与适用在风险预防原则指引下进行精细化打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首先，界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规制范围。生物安全法首次在国家层面以综合性立法的形式对生物安全进行了法律界定，拓展了生物安全的法律内涵，实现了对生物安全风险的整体性、针对性防控。

其次，建立健全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领导体制。生物安全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分别对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机构、各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相关制度进行了明确，为实现国家领导下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再次，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原则和制度。生物安全法要求“维护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并且明确了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等基本原则，同时还明确了多个基本法律制度，从而为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全链条”防控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依据。（《潇湘晨报》2021年4月15日）

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进一步夯实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切实解决好“种子和耕地”等要害问题。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开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坚持良田粮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粮食品种品质品牌提升、粮食质量追溯提升、粮食机械装备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提升“六大行动”，促进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提升粮食供给体系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开展粮食节约行动，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加强全链条管控，推进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

仓储设施升级改造，大力推广绿色低温储粮技术，实施农户和居民科学储粮项目。

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科学确定储备规模，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充分发挥中央储备粮“压舱石”和地方储备粮“第一道防线”作用；建立社会责任储备，实现功能互补、权责清晰、统筹高效。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认真抓好政策性收购，推动主体多元、渠道多样、优粮优价市场化收购，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强监管、压实责任，提高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实行党政同责，强化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压紧压实保障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增强各级党委和政府重农抓粮的思想行动自觉。（《求是》2021年8期）

信息快递

内地专项治理快递过度包装 香港商报经网4月7日报道，国家邮政局6日召开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管爱光解读今年3月施行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实现快递包装绿色环保节约，办法对于快递企业、寄递用户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管爱光表示，该《办法》是内地首部关于快递包装治理的专项部门规章，围绕邮件快件用什么包、怎么包、怎么管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了制度设计和条款内容，必将对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和邮政快递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办法强化了邮件快件包装源头治理，针对“包装选用”单设一章，明确了包装选用要求和原则，规定寄递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包装物管理制度，采购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装物，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邮件快件包装，减少包装物的使用，同时加强对协议用户的引导和管理，推动共同落实绿色包装要求。

中国资本大幅流出风险极小 香港商报经网4月10日报道，4月9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409，上调54点。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贬值幅度只有160个基点，贬值幅度微乎其微，相比今年以来美元指数累计最大反弹3.5%，人民币仍显相对强势。人民币汇率显现相对强势，使得人民币资产继续受到外资追捧。加上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已持续成为跨境资金流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净买入4946亿元中国债券，同比大增173.41%。

内地将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香港 阿思达克财经网 4 月 12 日报道，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和“赛马”等制度，推动技术总师负责制，组建创新联合体并组织重大创新任务，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等。同时，将探索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发展，鼓励支持自主创新产品迭代应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建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

乡村振兴促进法通过 香港 中评网 4 月 29 日报道，过三次审议，4 月 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从此，我国促进乡村振兴有法可依了。这部法律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乡村振兴促进法包括 10 章，共 74 条。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建立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制；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

本期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高层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韩南

地址：文化中心 D 座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107189

编辑日期：2021 年 6 月 3 日